

如何才能跨越经济增长的陷阱*

华 民

本文从国别对比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三种增长陷阱（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代际贫困陷阱）的成因、后果以及各国的应对措施。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只有“制度红利”、“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得到充分的释放，中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日成为一个高收入发达国家。

关键词：经济增长陷阱 国别经验 中国应对措施

世界经济的历史开始于1500年。1500年之前，世界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农耕文明过低的生产率让任何投资变得没有意义。1495年的远航，让人们逐渐找到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那就是美洲金矿的发现，从而揭开了世界经济的历史。但是，在工业化开始之前的时代，经济增长仍然极其缓慢。从1500年至1820年，全球GDP从2400亿美元增长到69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0.3%。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加速，从1820年至1900年，全球GDP从6950亿美元增加到了198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提升到了1.32%。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从1900年至1992年，全球GDP从19800亿美元增加到了2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也上升为3%，比之前的一个世纪提速一倍以上。从1992年至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取得

华民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了可喜的进展，全球GDP已经增加到6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的增速虽有所下降，但仍然以3.5%的速度在发展。^[1]然而，尽管世界经济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享受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当一部分国家的人民生活衣食无忧的高福利社会中时，为数不少的国家的民众则依然生活在贫困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充满了陷阱，以至于一不小心便会掉入某种陷阱，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机会。

经济增长中的三种陷阱

改善人们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带来两大效应：第一，延长人的寿命；第二，可以让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和坚强的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的统计，人均收入达到8000到10000美元以上，人口的平均寿命就可以达到75岁左右；人均收入达到30000美元以上，便可突破财务约束，实现个人自由。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对于生活在任何国家的人们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未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原因就在于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陷阱，很多国家掉进了这些陷阱后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具有代表性的增长陷阱大致上有三种：第一种是在低收入国家中常见的“马尔萨斯陷阱”；第二种是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种则是在部分发达国家中可以见到的“代际贫困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指，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增加不断地稀释人均资本占有量，从而使得人均产出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并造成人口基数不断扩大与人均收入增长趋于停滞的现象；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给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定义是，这些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从而陷入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至于“代际贫困”，则是指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因为经济增长停滞而导致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收入普遍下降的现象。

[1] 约翰·麦克尼尔, *A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th edition, 1998.

[2] [美] 安格斯·迪顿著, 崔传刚译: 《逃离不平等》, 中信出版社, 2014年。

如何才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从国际经验来看，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可以通过罗斯托定义的经济起飞来实现。^[1]经济起飞是一个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改革开放释放社会生产力，并不失时机地将资源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其中，对内改革是为了突破供给约束，对外开放则是为了突破需求约束。经济起飞能否成功，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把由此释放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转移到城市、支持工业化发展。

早期欧洲是通过变劳役地租为货币地租，从而释放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2]，推动了资本和自由劳动向更加有利可图的城市工商业的转移，实现了经济起飞。然而，法国却是欧洲的一个例外，法国人在重农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居然把从事工商业活动带来的收入重新投向土地，不仅没有实现经济起飞，反而迎来了一场“大革命”。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和二战之后的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则通过土地改革（私有化），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和价值，从而释放了大量的资本和自由劳动，并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和自由劳动力。^[3]

但凡没有照此行为的国家，很难实现经济起飞。比如在1960年代，印度进行了第一次“绿色革命”，通过引进并培育新品种、使用化肥、改进灌溉技术、推广机械化生产等措施，使得印度的农业生产率出现短期增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但是，印度并未能够在此基础上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所释放的资源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因而未能实现经济起飞。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起飞是非常成功的，我们通过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和开放农贸市场等改革，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并把由此释放的剩余劳动和产生的现金流量转移到了城市工业部门，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民工潮”，其规模可达3亿之巨，并且还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企业家与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再加上通过对外开放引进的将近3

[1][美] W.W.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法] 亨利·勒帕日著，李燕生译：《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3][美] 安德罗·林克雷特著，启蒙编译所译：《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万亿美元的外来投资，两者结合在一起，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迅速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为何难以跨越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1960年，世界上有10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和经济体。^[1]但是，最终却只有13个国家和经济体成功晋级为高收入国家和经济体。它们分别是：赤道几内亚、中国香港、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与希腊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对于大部分已经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基本上属于一个小概率事件。

为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会如此之小？综合世界各国的经验，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第一，未能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走上内部价值创造的道路；第二，未能适时地对仅仅适合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政府主导的追赶型体制加以改革，从而压制了市场力量发展的空间；第三，过度的收入再分配导致投资下降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致使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一）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经济起飞国家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起飞国家大都存在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根据巴罗和李的统计分析，印度25岁到29岁年龄段的人口平均受学校教育的年数不到6年，埃及、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为9年，中国与墨西哥大致是10年。而韩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则都在12年以上，特别是美国，存量人口，也就是60岁至64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口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年数也在12年以上。^[2]由上可见，年轻人口受学校教育的年数与经济发达的程度基本匹配，即平均接受学校教育年数在10年以下的大都为发展中国家，而超过12年以上的则为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且，代际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年数越是接近，经济增长就越是可持续。因此，任何国家或者经济体，若是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1]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世界银行出版社，2006年。

[2] Barro, R.J., and J.W. Lee,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 - 2010”,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4: 184-198, 2013.

其中，中等技术教育可以生产大量的“工匠”，“工匠”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精神，没有技术教育的投入，一个国家就不会有所谓的“工匠精神”；高等工科教育则可以促进研发和技术创新，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

从巴罗和李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凡是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经济体（正在准备跨越的中国与墨西哥除外），其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基本上都在8年以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国家或者经济体不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从经济起飞到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伟大飞跃。对此，我们大致上可以从私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通常可以区分为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两个部分。这两部分投资行为究竟是受什么因素驱动的呢？

政府介入能否解决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这既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也与政府干预的方法有关。从制度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发展教育的态度与政治体制高度相关。在集权体制下，为了显示统治者的英明伟大，通常都会推行“愚民教育”，于是在教育发展上就会产生两种情况：要么是公共教育投入不够，从而导致民众较低的读书识字率；要么就是对教育的内容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虽有读书识字率的提高，但是却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因为人们缺乏思想的自由和创造财富的知识教育。相反，在民治国家则会有较快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不仅是因为民选政府会有较多的教育投入，而且教育的目的旨在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再从方法上来讲，就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生性而言，政府在介入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究竟是去调整经济结构还是改善要素禀赋（即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分清两种事实：一是与实证研究有关的事实；另一种则是与政策有关的事实。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确实存在内生性；但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明确，在提升人力资本、改变禀赋和调整经济结构这两件事情上，哪一件事是应当由政府来做的，哪一件事则是政府不能做的。此外，就经济增长的逻辑来讲，没有禀赋结构的改善（人力资本的提升），又怎么可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呢？就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要低于市场而言，政府能做的事情应当是发展教育，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就经济增长的逻辑而言，当然是禀赋改善在先，经济结构调整在后。所以，凡是把经济结构调整置于优先地位的政策，既不

能达到预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因为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也难以实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政策目标（因为教育发展在政策顺序上被置后了）。一旦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起飞国家就会面临禀赋约束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体制转型滞后的经济起飞国家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起飞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起飞国家的体制特征是政府主导。为什么在经济起飞时期会产生这样的经济体制呢？原因就在于经济起飞时期缺乏一个有力量的本国私人企业家阶层，所以国家应当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某些私人不愿投资或无力投资的领域，还得依靠国家代行私人企业家的职能。但是，一旦实现经济起飞后，这样的经济体制就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政府虽然可以采用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大推进”方式来实现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1]，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系统等。但政府不是企业，政府在生产公共品方面是有优势的，但在生产私人产品方面则普遍缺乏效率。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缺乏信息，政府所拥有的企业又存在产权不清、激励不足和管理混乱等问题。此外，假如没有民主政治的制衡，即使是在公共品生产方面，政府部门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优势。从国际经验来看，没有民主政治的制衡，政府在生产公共品的过程中大致会产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具有自律性的政府会产生科尔奈所讲的“预算软约束”问题^[2]；二是那些缺乏自律性的政府则会产生严重的腐败和谋私问题。由此可能造成比发展停滞更为不良的后果^[3]。

进一步而言，追赶型、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还会压制企业家阶层和市场力量的崛起，并因此而造成经济增长的“空档效应”，即在政府投资趋于枯竭时，市场力量不能及时跟进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的失速。那么没有市场和企业的经济增长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一，没有价格信号；第二，不会有现代企业。没有价格信号就不可能让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只要不能做到资源有效配置，那么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没有现代企业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制造，没有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就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如果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中产阶级的规模又不够大，那么就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英] 尼尔·基什特尼著，张缘、刘婧译：《经济学通识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

[2][匈] 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李振宁、黄卫平译：《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3] 同[1]。

关于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学已经有了太多的讨论。但有几个要点必须明确：第一，只有根据价格信号进行资源配置，才能保证市场出清，避免产能过剩或者供给不足的失衡问题；第二，只有根据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生产者才能获利，投资才可持续；第三，处于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决策者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信息来解决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因为决策者不是交易的当事人，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一串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未必能反映消费者的偏好，也根本无法反映企业的生产函数，且具有时间上的滞后。不仅如此，消费者的偏好还具有随机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也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有好事者认为只要借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就可解决决策者信息不足或者信息质量偏低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数据并不是信息，信息是一个“知识包”。就以价格形成的机制来讲，它是经由人们的消费函数和厂商的生产函数共同发挥作用才形成的。因此，一个能够让市场出清的价格，不仅包含着有关消费者的知识（消费函数），而且也包含着生产者的知识（生产函数）。然而，我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所能收集到的则仅仅是既定价格下的交易量与交易频率，这虽然比计划经济体制下层层上报的统计数据在质量和加总速度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不构成决策者进行准确决策的信息。更何况，即使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也难免数据造假的问题。当然，今天的数据造假者已经不再是统计数据的上报者，而是普通的消费者。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源就在于网上点击是不需要支付成本的，以至于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操作的时候并不需要像在商场用货币去购买商品时那样进行过深思熟虑的盘算。因为从心理上来讲，用现金支付会有心理暗示，人们的购买行为会相对谨慎，但是在网上支付，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串数字，从而会相对轻率。

接着让我们来分析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充分理解企业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我们首先需要对企业家的效用函数加以分析。企业家与资本家完全不同，资本家是出于利润动机去寻找投资的机会，并通过获利而得到快感或幸福感的人，这种快感或者幸福感本质上是对其所拥有的财富在抽象数字上增加的一种愉悦而已。但企业家不同，按照戴维·兰德斯的说法，他们是一批善于把握贸易和创业自由机会的人，是拥有组织财富生产和让生产合理化之能力的人。^[1]这些人虽然不一定拥有资本，但是却拥有资本家所没有的知识，从而可以为企业

[1][美]戴维·兰德斯、[美]乔尔·莫克、[美]威廉·鲍莫尔著，姜井勇译：《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

创造价值，那就是所谓的“知识溢价”。在现代企业中，他们虽然也承担着作为出资者的资本家的代理人之角色，但同时又具有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体现在企业家的效用函数中，就是对非金钱和非物质“财富”的追求，正是这种对非金钱和非物质财富的追求形成了企业家所独有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这种非金钱和非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意义”和“价值”，它们集中体现在企业经营和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充实感、满足感和成就感。^[1]基于效用函数的差别，资本家关注的是投资损益，而企业家关注的是财富和价值创造，结果，资本家会更更多地集合在金融领域中，而企业家则会扎根于现代企业中。资本家关注的是消息，而企业家关注的则是市场需求。资本家在选择企业家，而企业家则在选择更为合理的财富生产方法。从动态的角度讲，当企业经营出现困境时，资本家会选择退出，而企业家则只能选择创新，因为经营不善就意味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报废，这与资本家投资失误造成的资产减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是这样的区别，使得熊彼特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2]

那么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答案是不会有经济增长。其后果是：经济起飞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工业化国家则有可能掉入“代际贫困的陷阱”。前者如阿根廷和经济转型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后者要数日本和英国最为典型。阿根廷有大农场主，但是却没有企业家，于是难以把资源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实现持续增长，最终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苦苦挣扎。经济转型前的计划经济国家有制定宏伟规划的行政官僚，但是也没有企业家，从而导致根本性的资源错配，以及无处不在的对于创新的压制，最后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直至崩溃。即使是在那些曾经诞生过伟大企业家的工业化国家，一旦企业家阶层开始淡出，企业家精神随之消失，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不是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就是掉入“代际贫困陷阱”而难以自拔。前者如英国，后者如日本。英国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土创新制造和出口贸易阶段；殖民地贸易阶段；以及海外投资发展阶段。在英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企业家辈出，英国本土充满了企业家精神，于是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工业化国家。但是，随着殖民地贸易的兴起，英国很快由一个本土制造出口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垄断全球贸易的国家，

[1]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国家的活力”，《比较》，2017第4辑，第1~33页。

[2][美]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祥译：《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其结果是制造被贸易所替代，企业家被商人所取代，最后，在争取贸易自由和主权独立的美国冲击下，还失去了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英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在殖民地国家修建公路铁路、港口码头，从而导致英国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退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因此而变成了工程承包商，英国的经济增长也随之趋于下行。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和解放，在殖民地国家国有化的浪潮中，英国在海外的巨额投资几乎“清零”，英国的经济增长从此陷入困境，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也随之丢失。日本原本就是一个缺少企业家的经济体，因此日本的企业虽然拥有了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大都不好。日本的研发效率在世界领先，在各类科学研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日本只有比例很低的专利通过技术创新最终演化成为可以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这与美国构成很大的方差，原因就在于日本缺少企业家。把科学发明形成的专利演化成为可以在市场销售的产品正是企业家的行为，没有企业家，大部分专利都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日本很多企业经营者都算不上是企业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第一，缺乏全球战略，日本盛行的是垂直整合为主的自行采购主义，而不是全球产业链整合；第二，缺乏市场发展战略，公司管理过于封闭，对技术过于自信，忽视来自于市场的信息，比如在照相机领域重视像素而不是功能，从而败给了苹果，在手表行业重视时间精准，而不是手表氛围的设计，从而败给了瑞士；第三，缺乏财务战略，过多依赖间接融资，对于风险资本缺乏知识和经验，故而做不了创新。面对198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日本的企业不能做出积极而又有效的反应，反而走向了泡沫经济，最终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无奈地走向“代际贫困的陷阱”。^[1]

（三）过度的收入再分配会使经济起飞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起飞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面临的第三个难题是如何有效解决经济起飞后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总是会伴随着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不外是机会不均等与创造财富的能力在人群中的不均等分布，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函数。一般而言，教育机会越是均等，人们的能力方差就会越小，从而创造财富的能力就越是趋于接近。

机会不均等可以从多个角度观察到。

[1][日] 岛田晴雄著，章慧南译：《盛衰：日本再生的秘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

第一，教育机会不均等。根据尤瓦尔·赫拉利的研究，今天的人类与原始人类相比，在基因上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今天人类的智商之所以高于原始人类，原因不在基因，而是在于教育。^[1]因此，教育机会是否均等对于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但是，教育机会不均等在经济起飞国家则是一种普遍现象。经济起飞是一个从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经历一个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通常都会出现工业化的城市和传统的农耕乡村并存的状况，由此造成的城乡差距必导致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均等配置，从而导致城乡人口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即使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哪怕是面对同等的教育资源，也会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而不能获得同等的机会，原因在于接受教育的成本并非完全是由政府承担的，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私人成本。

第二，就业机会不均等。有很多因素在决定着人们的就业机会，首先当然是接受教育的程度，其次是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最后还要看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包容性。经济增长是否有包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与经济结构合理与否有关系。一般而言，只要经济结构与劳动力供给在结构上不相匹配，就会出现就业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有些工作岗位会供不应求，有些岗位则会供过于求。对于大部分经济起飞国家来说，为了实现经济赶超，通常都会追求要素禀赋偏高的经济结构，从而会加重就业机会不均等的问题。

第三，由居住不自由带来的机会不均等问题。在经济起飞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趋于集聚的，因此，当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居住地时，便会产生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人口在经济起飞国家不能自由流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由制度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国家所有的制度，由于土地不能自由交易，便会制约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此外，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等也会限制人们在城乡与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从而让人们失去本来能够得到的就业机会。

基于以上各点，在统计上就会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随着经济起飞，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会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起飞国家的政府若是过于倚重收入再分配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其结果都不太好。原因就在于收入再分配的成本很高，收益却很低，且不可持续。收入再分配至少会产生以下

[1][以] 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

几个问题：第一，收入再分配通常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来实现的，这会强化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从而会对市场力量的崛起产生不利的影 响；第二，当政府面向低收入阶层的各种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转移支付大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产出时，便会产生闲暇的激励，从而导致全社会有效劳动供给的下降，其结果要么是劳动成本的上升，要么是企业在高成本的压力下选择退出；第三，收入再分配需要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这会减少投资，当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较高时，就有可能发生移民和资本外逃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会对经济起飞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一旦经济增长“失速”，就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上文的分析，经济起飞国家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认真解决如上所述的三个问题：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适时推进经济体制转型；第三，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

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前提是建设制度性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从经济起飞时期政府主导的体制过渡到市场主导的体制，否则市场就会成为政府手中任凭摆布的猎物，这就很难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那么究竟什么是制度性的市场经济呢？根据约翰·麦克米兰的定义，制度性市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一个已经确立的产权系统来保证所有参与者的自由和公平交易，这可以从制度上防止政府对民众的财富掠夺；一套可执行的规则和法规来约束个人之间的契约，这可以防止人们彼此间的掠夺性交易；由一套透明化的信息所形成的稳定的价格系统，这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1]假如没有这些制度要素，就很容易造就掠夺性政府与掠夺性交易，以及资源错配。很多经济起飞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没有把经济起飞时、政府动员式的经济体制转化成为制度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前一种体制下，市场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通常会相机抉择地加以利用。但是在制度性的市场体制下，市场将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经济起飞后，变非制度性的市场体制为制度性的市场体制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任务。

只有完成从非制度性市场体制向制度性市场体制的转型，才有可能实现政府

[1][美]约翰·麦克米兰著，余江译：《重新发现市场：一部市场的自然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

职能的转变，进而承担起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的职责。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起飞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禀赋基础。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决定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个人得利，同时也可让整个社会获利。因此，政府有责任承担起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通过改变社会禀赋来提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经济起飞国家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创造内部价值，进而达到高收入阶段；二是沿着所谓的特定优势实现经济增长，较少创造内部价值，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适时地转变政府职能，从经济起飞时期的投资主体转变为服务主体是理性的选择。

针对经济起飞后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可以通过推行包容性增长来加以控制和缩小。但决不能采取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来缩小人们间的收入差距，也不能推行标准过高的社会福利制度来实现社会公平，因为这两种方法都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包容性增长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就业机会均等；居住自由与迁徙自由；并尽可能确保禀赋结构与经济结构、特别是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均衡。

最后，还得坚持对外开放，保持较大的对外开放度（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就像蒂莫西·泰勒所说的那样，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对外贸易而成为发达国家的。^[1]贸易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突破需求约束、促进分工，并且还可以带来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

什么样的国家会掉入“代际贫困的陷阱”

经济起飞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高，但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则有不少国家掉入到了“代际贫困的陷阱”，甚至还有个别国家重新跌入中等收入国家序列。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缺乏本土创新，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或者陷入各式各样的经济危机。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对创新加以定义。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对创新做了极具启发性的定义：发明不是创新，事实上发明很少能够成为创新，世界上大部分发明专利都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复制”、“转让”、“适应”都不是创新，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应用”；改头换面的“旧创意”更不是创新；引进

[1][美]蒂莫西·泰勒著，林隆全译：《斯坦福极简经济学：如何果断地权衡利益得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外部技术也不是创新，它只是对“外部创新”的模仿；真正的创新是内生的、本土的创新，其基本内涵包括，新的创意、对资本与劳动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构思和生产新的产品、最终完成生产和销售过程。^[1]

本土创新做的最好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德国。美国的本土创新大都是具有原创新意的熊彼特创新，那就是所谓的“毁灭性创造”。就像沃尔玛淘汰了杂货铺；电脑淘汰了打字机；数码照相淘汰了胶片照相；平板电视替代了传统电视；宽带替代了电话。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毁灭性创造属于流量离心进化竞争，从而可以避免在存量经济中的成本竞争或者价格竞争，因而具有先发优势。德国的本土创新虽不及美国，即缺乏像美国那样的毁灭性创造，但是德国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比如大学的实验室建在企业等），坚持产品品质创新，从而也成功避免了存量经济中的价格竞争或者成本竞争。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产品品质的提升可以让企业成为行业或者部门、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异质企业，这不仅可以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定价权，而且可以确保创新成本的回收，从而带来可持续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本土创新，让美国与德国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明星国家，而没有像日本和英国那样掉入“代际贫困的陷阱”。

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掉入“代际贫困陷阱”的日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包括英国，基本上都属于缺乏本土创新的国家。日本有模仿、也有科学发明（日本在科学领域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但是却没有本土创新。日本缺乏本土创新的原因在于企业家资源的稀缺，导致日本企业家资源稀缺的根源在于儒家文化与武士道精神，前者主张等级秩序、后者主张上下级服从关系，缺乏个人自由，企业管理又过于封闭、且有严格的层级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通过对外贸易和整体性、连续性的学习很快掌握了世界先进技术，但是，由于缺乏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创新的组织构架，日本在进入技术前沿后便失去了前进的方向。面对来自于国际的压力，日本又在本币升值后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从而使得日本最终走上了泡沫经济的发展道路。1989年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长出现长期停滞，终于掉入“代际贫困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英国原本是一个充满企业家精神的国家，通过发明创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随着殖民地贸易的拓展，以及英国政府在海外殖民地的大规模投资活动，英国的企业家精神逐渐退变。如上所述，造就英国经济奇迹的企业家

[1]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国家的活力”，《比较》，2017第4辑，第1~33页。

先后转变成为积极从事殖民地贸易的贸易商和承包英国政府在海外建设工程的承包商。从1906年开始，英国的国际地位便被美国赶超。到了1945年，英国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告独立解放，将英国在海外的投资收归国有，从而使得英国在海外的资产几乎清零，英国随之变成一个世界二流国家，逐渐滑落到了“代际贫困的陷阱”。

南部欧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60年代还属于中等收入国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这些国家过高的福利（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再加上加入欧元区以后的名义汇率上升，导致这些国家竞争力的下降。但是，在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逐渐趋弱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仍然坚持原有的福利和消费水平，从而必须依靠对外举债来加以平衡。然而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到了2013年终于爆发了债务（欧债）危机。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正在从高收入国家向着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回归。

虽然，今天的中国还不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但是，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国别经验对于有机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还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前瞻意义的。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争取早日成为一个高收入发达国家。借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通过发掘三大红利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跨越，这三大红利就是“制度红利”、“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发掘制度红利，就是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那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发掘土地红利，就是要通过土地流转进一步释放土地价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中国农村人口的占比仍然高达40%以上而言，农村可以提供的剩余劳动之数量仍然非常可观。发掘人口红利，随着中国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流量人口红利确实在消失，但是就中国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国有企业改革与转型中的下岗人员并未完全回归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存量的人口红利还是极其巨大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事实，如果能够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得到进一步发掘。一旦这三种红利得到充分的释放，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便会大大提高。■